

家庭经济脆弱性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动态^{*}

张冀 祝伟 王亚柯

内容提要:家庭经济脆弱性不仅能有效度量风险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能衡量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因此成为西方理论界近年来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内涵和测度、家庭经济脆弱性与居民消费、家庭应对经济脆弱性的能力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以厘清家庭经济脆弱性研究的发展脉络。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界定和测度还没有形成共识,且缺乏完整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框架,但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视角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清晰认识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及家庭应对能力,这不仅拓展了我国居民消费的研究视角,更能为我国政府制定、评估和改进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家庭经济脆弱性 风险冲击 居民消费 家庭应对能力

一、引言

家庭福利和消费是经济学领域中经典的研究主题,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文化制度、家庭经济和人口特征等在内的众多影响因素被广泛关注(Keynes, 1936; Browning & Crossley, 2001; Attanasio & Webber, 2010)。然而这些研究侧重于风险对家庭福利的影响程度,很少关注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如果家庭应对风险能力高,即使遭遇风险冲击,通过采取合理的应对方法,也能有效抵御风险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相反,如果家庭应对能力低,较小的风险波动对消费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家庭消费的相关研究更应该聚焦于家庭风险应对能力上。

在风险应对措施上,西方居民家庭除了储蓄之外,还可以通过完善的金融市场(如保险、正规金融市场借贷)以及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分散和抵御风险。而受风险态度、消费理念、居民金融可得性、不健全的资本市场、金融工具的不足、有限的金融知识等约束,我国居民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明显不足,多数家庭居民更倾向于采用预防性储蓄应对所有风险,导致我国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尽管储蓄是居民最常见的一种应对风险方法,但有其自身

缺陷,无法应对所有风险且会产生较高的机会成本,而作为家庭应对风险的重要财务工具,我国家庭的人身保险持有率还很低。这些都使得我国家庭面临的风险无法得到有效化解或降低。因此,居民家庭不仅需要识别影响家庭消费和福利面临的主要风险,更重要的是,当遭遇风险时,家庭能够提高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采取合理的措施应对风险。遗憾的是,虽然家庭消费研究都已取得长足发展,但将风险与应对措施结合的研究很少。近年来,部分国外研究从家庭经济脆弱性视角分析风险对家庭福利和消费的影响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它不仅可以有效测度风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也能反映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虽然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框架。即便如此,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视角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清晰认识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及家庭应对能力,为我国政府制定、评估和改进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因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依赖于不断评估以往政策效果,修正改革方向,这就需要掌握各种风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和机制,帮助居民家庭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因此,结合西方家庭经济脆弱性理

^{*} 张冀、祝伟、王亚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邮政编码:100029,电子邮箱:zhangji1030@126.com。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5YJA790082)、北京社科基金项目(15JGB09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CXTD5-04)。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论和中国实际的相关研究更应该得到重视。

本文通过梳理国外家庭经济脆弱性现有文献,归纳出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内涵、风险因素及应对方式,提出其未来研究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家庭经济脆弱性:界定、内涵与测度

(一)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界定与内涵

脆弱性早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社会、经济、心理、自然等领域的研究中。在经济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经济、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化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引起相关学者对于经济脆弱性问题的关注,Minsky(1982)研究了金融领域的脆弱性问题,引入脆弱性来描述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各种风险冲击的后果,这些冲击可能导致市场价格和资金流量发生未预期的变化,从而使金融公司面临倒闭的风险,这种风险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支付机制及金融体系提供资金的能力。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势必会影响微观家庭的经济决策行为,反映在家庭福利和消费的变动中。因此,从20世纪末开始,脆弱性被引入家庭福利分析框架中。早期的家庭脆弱性研究主要关注家庭贫困问题,一部分研究认为脆弱性是实际消费与贫困线水平的消费之间的差异。当家庭消费和福利水平降至贫困线以下,则家庭是脆弱的(Kochar, 1995; Dercon & Krishnan, 2000);另一部分研究认为脆弱性就是家庭消费水平低于贫困线的可能性。Pritchett et al(2000)与 Mansuri & Healy(2001)将脆弱性概念化为一个家庭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经历一次贫困的可能性。Chaudhuri(2000)更加具体地将脆弱性定义为在某一时间段内一个家庭变成或者保持贫困的可能性。Alwang et al(2001)将脆弱性定义为未来家庭消费遭遇下降的可能性,这是相对于贫困线而言。一个家庭只要面对未来福利损失的不确定性就是脆弱的,而脆弱性的程度依赖于风险的特征以及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Chaudhuri et al(2002)和 Chaudhuri(2003)将期望贫困视为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 VEP)。Kuhl(2003)认为脆弱性是家庭遭遇严重经济冲击并且将家庭的福利水平拉低到一个社会可接受水平之下的倾向性。Holzmann et al(2003)认为脆弱性是一种风险,对当前非贫困者而言是落入贫困线以下的风险,而对当前的贫困者而言,是继续维持贫困状态或陷入更深贫困的风险,因此,脆弱性是未来家庭消费

或效用变成贫困或更加贫困的概率,这种定义是结果导向方式的脆弱性(Scaramozzino, 2006)。

上述研究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脆弱性的研究对象聚焦于贫困家庭,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无法适用于普通家庭的脆弱性研究,因为普通家庭的财富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遮掩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另一方面,上述脆弱性的度量需要一个贫困线作为基准,而贫困线是动态的且具有主观经验判断,所得结论可能引起争议。

后期研究将脆弱性扩展至普通家庭消费问题。Bernheim et al(2001)将家庭脆弱性视为由配偶死亡引起的家庭消费水平下降比例。这个界定不仅可以对比死亡风险冲击对同一个家庭消费的影响,还可以对比不同家庭的脆弱性。Bernheim et al(2003)又将脆弱性视为家庭最高的稳定生活水平与夫妻一方死亡后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Lin & Grace(2007)则将脆弱性界定为由家庭收入主要来源者死亡导致的家庭生活水平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纳入了劳动和非劳动收入、家庭成年成员死亡概率、消费收入比以及年龄等影响因素。Ligon & Schechter(2003)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创新了脆弱性的含义,认为脆弱性是家庭消费的期望效用之间的差异,即无风险下的家庭确定性等价效用和有风险的家庭期望效用之差。这种方法把脆弱性纳入期望效用的框架内,将个人或家庭的主观偏好反映到对效用函数的选择中,因此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和应用(Jha et al, 2010)。但由于该分析框架中家庭的有风险期望效用中包含贫困风险,因此,研究的侧重点仍然是贫困家庭的消费问题。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研究将家庭的脆弱性视为在一个风险环境下家庭消费及效用的下降程度或波动,但脆弱性的范畴还没有形成共识,既有家庭贫困脆弱性,又有家庭财务脆弱性,不同的范畴侧重点不同。尤其是,现有文献多数没有从风险源的视角切入,只能刻画风险对消费影响的现状,没有考虑家庭采取合理工具提高应对能力之后风险对消费的影响。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是普遍的,但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也会影响脆弱性和家庭消费。因为即使收入不高,但只要应对能力高,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因此,家庭的脆弱性不仅应该衡量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还应该反映出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只有从风险源视角分析风险对家庭消费

的作用机制,才能有效提出合理应对方式。尽管 World Bank(2001)将脆弱性界定为家庭消费和福利的下降程度以及家庭应对风险冲击、恢复消费水平的能力,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这种能力。结合现有脆弱性内涵,本文认为家庭的脆弱性可以界定为家庭经济脆弱性,因为它可以有效包含已有研究对家庭脆弱性的界定,也可以反映出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由家庭采用的应对措施所刻画出的家庭应对风险能力的差异。

(二)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测度

由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内涵还没有形成共识,因此在测度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部分学者采用家庭消费陷入贫困的概率来衡量家庭经济脆弱性。如 Pritchett et al(2000)用概率 $V_i = Pr(Y_{i+1} \leq Z)$ 来测度家庭消费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其中, Y_i 是在时间 $t+1$ 时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 z 是贫困线的消费水平。这种方法简单清晰,得到了 Kuhl(2003)以及 Zhang & Wan(2006)的认可。Chaudhuri(2003)认为家庭 i 在时间 $t+1$ 的脆弱性水平由 $VEP_i^t = Pr(income_{i+1}^t \leq Z)$ 来测度。其中, $income_{i+1}^t$ 是 i 家庭在 $t+1$ 时期的人均收入, Z 为贫困线,如果能事前估计出收入 $income$ 的概率分布,那么脆弱性就可以采用 $VEP_i^t = \int_0^z f(income_{i+1}^t | income_{i+1}^t)$ 来测度,因此,测度脆弱性的主要挑战就是概率分布 f 的估计(Christiaensen, 2002)。然而这种测度方法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在贫困线的选择方面,因为贫困线是一个均值,无法准确反映国家间或者地区间的发展水平。比如,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东部的贫困线水平在西部可能就不属于贫困,因此贫困线就不能准确评估具体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另外,根据概率测算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的衡量方式存在主观性,Chaudhuri et al(2002)、Zhang & Wan(2006)等人认为,当一个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大于 50%,则这个家庭就陷入贫困,但这一概率并不适用于普通家庭或中等收入家庭的脆弱性。

也有部分学者采用贫困水平与预期贫困水平的差异来测度家庭经济脆弱性(Kamanous & Morduch, 2002)。Bernheim et al(2001, 2003)构建了由死亡风险引发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假设家庭购买保险后家庭消费水平是最高的(因为保险的保障功能促进了消费),在假设丈夫或妻子死亡后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是最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经济脆弱性可以用两者之间的差值表

示,即:

$$Impact = c^* - c \quad (1)$$

$$其中, c^* = Y/2^a [(1+p_b) + (p_w + p_h)] \quad (2)$$

其中, $Impact$ 为经济脆弱性,反映出家庭主要成员死亡后居民消费的下降程度, c^* 为家庭无死亡风险下的消费水平,如果丈夫和妻子都购买了保险,那么家庭的消费水平最高且可持续, c 表示主要成员死亡后家庭没有保险情况下的消费水平,它受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健康等因素影响。 p 表示保险单的价格, p_b 、 p_w 、 p_h 分别代表夫妻都健在时购买了保险的保单价格、妻子购买的保单价格以及丈夫购买的保单价格。 Y 是家庭财富加当期收入, a 是家庭规模因子。这种经济脆弱性指标可以反映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水平平均下降程度的影响,其有效性基于美国居民的消费具有良好平滑性的事实。Lin & Grace(2007)则构建了由死亡风险引发的家庭经济脆弱性来衡量消费水平的波动性。

$$impact_i^2 = q_{x,i}^{hus} (impact_{wife,i} \times Y_{hus,i} \times a^{\frac{1}{65-x}})^2 + q_{y,i}^{wife} (impact_{hus,i} \times Y_{wife,i} \times a^{\frac{1}{65-y}})^2 \quad (3)$$

$impact$ 是丈夫或妻子死亡引发的经济脆弱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其中, $impact_{wife,t}$ 是第 i 个家庭中的妻子死亡引发的经济脆弱性。 $Y_{wife,t}$ 是妻子的收入。假设丈夫或妻子在 x 岁时死亡,那么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绝对值在 $(65-x)$ 期间内会下降。 q 为死亡概率,其中, $q_{x,i}^{hus}$ 表示第 i 个家庭中的丈夫在第 x 岁时的死亡概率。 $a^{\frac{1}{65-x}}$ 是一个年金因子,反映了丈夫或妻子在 x 岁死亡时对家庭未来 $(65-x)$ 年消费影响的现值,这个值越大,意味着死亡者的年龄对家庭未来消费需求的影响越大。这个经济脆弱性指标综合考虑了家庭的劳动性收入、年龄、消费行为(消费倾向)、家庭规模等因素,可以全面反映家庭主要成员的死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但缺少对家庭消费水平下降程度的研究。

综上所述,早期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度量指标相对简单,如采用风险发生的概率来衡量。后期则针对某种风险构建了包含收入、年龄在内的经济脆弱性指标来衡量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如消费的波动性或绝对值下降程度,但没有比较两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因此无法帮助居民家庭选择相应的风险规避方式,这一点对我国家庭居民应对风险尤为重要,因为与美国居民消费具有的平滑性特征相比,我国居民家庭生命周期的消费随着收入的变动而变动,并不具有平滑性(Chamon & Prasad, 2010;

Chamon et al 2013)。风险冲击不仅导致我国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下降,还可能引起居民消费的剧烈波动,此时基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难以有效捕捉这一波动效应。这就需要我国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将包含跨期效应风险对家庭消费水平冲击的后果分解为消费水平平均下降的影响和消费水平波动的影响两个部分,并探究家庭应对风险冲击而选择的方法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Ligon & Schetcher(2003)用确定性等价效用与家庭期望效用之差衡量家庭经济脆弱性:

$$V^i = U^i(z) - EU^i(C^i) \quad (4)$$

其中, V^i 为家庭经济脆弱性, z 为确定性等值消费。当家庭消费大于这个值时,就认为这个家庭不是脆弱的,该值是根据相关贫困性研究文献选取的,贫困线相近。他们进一步将风险导致的居民家庭福利变动的经济脆弱性指标进行分解:

$$V^i = [U^i(z) - U^i(E_c^i)] + [U^i(E_c^i) - EU^i(c^i)] \quad (5)$$

式中 V^i 为度量家庭 i 的经济脆弱性指标, z 代表家庭陷入贫困线下的消费水平, c 表示家庭预期消费水平。公式(5)右端的第一项表示无死亡风险时家庭消费的效用水平与存在风险时家庭期望消费的效用水平的差,反映了风险导致的家庭平均消费水平下降所对应的效用水平下降,公式(5)右端的第二项表示风险影响下家庭期望消费的效用水平与家庭消费的期望效用之差,反映了由于风险导致消费水平波动而对家庭效用水平的下降。

作者进一步将第二项分解为贫困风险、聚合风险、异质性风险以及不可解释风险。这种测度方法可以在家庭偏好的微观基础上将消费下降程度和波动性进行分解和测量,有利于寻找影响家庭经济脆弱性的主要因素。然而,作者并没有进一步将这几类风险细分,因此无法解释哪种风险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及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尽管已出现从家庭经济脆弱性视角研究家庭的消费和福利问题,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首先,多数研究只是针对一种风险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忽视了多种风险的遮掩或叠加效应,如死亡风险和健康风险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另外,需要构建一个包含多种风险在内的综合家庭经济脆弱性体系,既可以从整体风险视角衡量脆弱性,又可以单独分析某种具体风险引起的脆弱性。其次,文献侧重于实证分析,理论研究

还需进一步深入。现有研究只是初步将风险冲击分解成聚合风险、异质性风险以及不可解释风险(Ligon & Schetcher, 2003),没有将异质性风险和不可解释风险进行细分,因此无法刻画死亡、健康和负债等具体风险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路径。更重要的是,没有将家庭经济脆弱性、家庭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变化和家庭相应的应对风险能力纳入到一个整体分析框架中,系统、动态研究各种风险冲击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此对比分析家庭应对风险冲击能力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生命周期消费和福利的差异。这就不仅需要构建完善的家庭经济脆弱性测度体系和指标,更需要将其纳入到家庭期望效用的框架内,将个人或家庭的主观偏好反映到对家庭效用函数的选择中,建立一个既考虑到消费或福利,又考虑到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符合中国实际的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刻画家庭经济脆弱性对家庭福利的动态作用机制。

三、风险、家庭经济脆弱性与家庭消费

从上述家庭经济脆弱性的范畴可以看出,脆弱性的来源是风险冲击,所以风险识别就成为家庭经济脆弱性研究的前提,也是已有文献的研究重点。影响家庭经济脆弱性的风险因素有很多,既有外部宏观风险,也有家庭异质性风险。前者是一种聚合风险,对所有家庭都会造成冲击,无法反映出微观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的异质性,后者更能刻画家庭应对风险的差异性,也能衡量风险对消费影响的异质性。Ligon & Schechter(2003)将脆弱性分解为贫困风险、异质性风险、聚合风险以及不可解释风险,这是将整个风险作为研究对象,没有分析哪种具体风险,因此,文章结论认为不可解释风险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本文主要侧重于梳理家庭异质性风险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综合已有研究,主要分析死亡风险、健康风险和负债风险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

死亡风险是家庭普遍面临的重要风险,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非常突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的死亡将导致家庭收入的永久性减少,会使得家庭的消费水平急剧下降(Hurd & Wise, 1989)。Auerbach & Kotlikoff(1987, 1991a, 1991b)发现,当家庭中丈夫死亡后,消费水平下降超过25%的家庭占比在三分之一以上。Bernheim et al(2003)以美国家庭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由死亡风险引发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家庭经济脆弱性的

平均严重程度和平均发生概率分别为 10.7% 和 16%；如果夫妻双方都上班，则家庭经济脆弱性对消费造成的下降程度和发生概率分别下降 9.9% 和 19.3%；当有一方死亡，家庭经济脆弱性引发的消费下降程度和发生概率分别上升 13.5% 和 23.9%，尤其是丈夫死亡导致 51.89% 的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下降 20% 以上。这反映出死亡风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较大，同时也意味着家庭的规模经济可以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Lin & Grace(2007) 引入消费波动性的度量对 Bernheim et al(2003) 的脆弱性指标进行了拓展，侧重于衡量当家庭主要收入者死亡后家庭生活水平的波动性，并比较了家庭经济脆弱性在不同年龄段家庭的异质性。研究发现，20~34 岁的年轻家庭经济脆弱性高于 35~49 岁和 50~64 岁家庭。

健康风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早已引起学者的关注。当家庭成员受到健康冲击时，则会导致该家庭生活消费的减少、医疗支出以及健康投资的增加。如果是家户中主要收入来源者受到严重的健康负向冲击，很可能产生持久的影响。早期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健康状况对家庭消费的边际效用影响。Viscusi & Evans(1990) 发现健康状况下降会降低消费的边际效用，而 Rust & Phelan(1997) 认为健康状况对消费的边际效用没有显著影响。Lillard & Weiss(1997) 采用动态优化方法分析了健康风险和生存风险对退休家庭储蓄和消费决策的影响。认为健康状况对家庭总消费没有影响，但对家庭内部成员消费的边际效用产生影响，健康变化会导致消费效用在家庭成员内部转移，消费主要从健康好的一方转向健康差的成员。例如，假设家庭总消费是 8000，健康状况良好的成员消费 2000，而健康状况差的消费 6000。这一结论与 Rust & Phelan(1997) 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当健康变差时，一些富裕家庭自行承担的医疗成本太低，无法看到家庭资产的明显减少。Edwards(2008) 指出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变化将显著地改变家庭跨期消费的边际效用，从而可能显著地影响家庭的金融决策。他通过建立一个考虑健康影响因素及其变动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下降降低了家庭的消费和福利，从而影响家庭效用。作者进一步对家庭效用进行二阶求导得出其边际效用，发现边际效用的改变对家庭资产配置也存在显著影响。其经济直觉是不同的健康水平下家庭非健康消费的效用水平显

著不同，从而会影响其财富配置。

后期的研究侧重于健康对消费水平的影响。Gertler & Gruber(2002) 采用客观身体健康指标 ADLs 进行研究发现，当健康状态从 5 变成 1 时，消费水平下降 20%。Asfaw & Braun(2004) 针对埃塞俄比亚农村家庭研究了疾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认为健康对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尤其是对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冲击。当户主从健康转向不健康状态后，家庭食品消费下降 30% 左右，非食品消费下降 29%。French & Jones(2011) 构建了一个包含个体健康状况、不确定性医疗支出、储蓄和投资在内的生命周期模型，基于美国 HRS(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数据对健康动态变化影响退休家庭退休后生命周期储蓄行为进行了拟合，发现由健康引发的不确定性医疗支出冲击增强了退休居民的储蓄动机。

尽管已有研究已关注到健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但多数采用截面数据，只能分析健康状态对现有家庭消费的影响，无法刻画生命周期内健康变化对消费的波动性影响。另外，这些文献构建的健康指标在定量分析中无法反映家庭经济脆弱性，更没有刻画家庭应对健康风险冲击的能力。

最后是家庭负债。居民家庭负债在合理的情况下能够帮助其平滑消费(Crook et al, 2007), Barnes & Young(2003) 分析了其中原因，认为平滑消费动机是家庭借贷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永久收入理论相吻合，即消费只对财富或者收入的持久性变动做出反应，在金融市场无摩擦条件下，家庭可以通过借贷保证消费的平滑性。Seefeldt(2015) 认为尽管脆弱性家庭负债的首要目的是平滑消费，然而，负债加剧了收入波动性产生的风险，影响家庭财务自由度以及家庭的效用。因为对于脆弱性家庭来说，借助负债平滑消费需要更多的负债满足现有消费和偿还以往负债。但如果负债负担过重，可能起到杠杆作用，进一步加剧死亡、健康等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Murphy, 1999; Olney, 1999)。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家庭呈现收入波动性和债务持续上升特点(Gorbachev, 2011),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有些文献将美国家庭消费水平下降归结为家庭债务的过度膨胀(Dynan & Kohn, 2007; He & Xiong, 2009,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Anderloni et al(2012) 对意大利的家庭负债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家庭负债的增加显著增加

了家庭经济脆弱性,尤其是当家庭持有较多的不安全负债时,这一效应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家庭负债行为具有双面性,既可以促进消费,也可以抑制消费,取决于负债是否合理。而对于合理的负债水平,现有研究并没有在理论上达成共识,更多的是经验分析。

四、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应对

正如本文前文所说,家庭经济脆弱性不仅反映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应该衡量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尤其是后者。因为即使家庭遭受风险冲击,只要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家庭消费和福利仍然可以较为稳定。Gorbachev(2011)发现,如果家庭能找到合理的应对方式,收入的波动性并不会必然导致家庭消费和福利的损失。Lypton & Ravallion(1995)认为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最大,因为他们的风险暴露大,如果没有更多的风险管理工具,财富的轻微减少就会对家庭造成巨大灾难。因此作者认为只有提高低收入人群的风险管理能力,降低这部分家庭的经济脆弱性,才有助于他们的财富积累,从而摆脱贫困风险。尽管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应对家庭经济脆弱性,但是大量国外的经验研究也证实其对居民当前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Engen & Gruber, 2001; Gruber & Yelowitz, 1999)。Hubbard et al(1995)认为社会保障能够降低消费者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尤其是医疗保险能够促进家庭消费。但社会保障制度是针对所有家庭,无法反映出家庭应对风险能力的异质性差异,因此,本文将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聚焦于家庭自身。通过梳理已有文献不难发现,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冲击,居民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进行风险管理:财富积累、保险保障及内部分担(如亲朋借贷),这些方式的作用机制不同。

财富积累是家庭应对风险冲击最常见的风险管理工具。从理论上说,风险厌恶型家庭倾向于通过积累财富来对冲风险冲击带来的消费水平下降(Deaton, 1992)。Lusardi et al(2011)发现50%以上的西方家庭是脆弱的,出于成本考虑,家庭更愿意利用预防性储蓄来抵御负向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然而,储蓄作为家庭最主要的风险管理工具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预防性储蓄应对的是所有潜在风险冲击,没有针对性,而不同的风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不同,因此,利用储蓄进行风险管理的机会

成本也不尽相同,家庭消费行为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比如,风险冲击家庭消费的影响包含消费水平的绝对下降和消费的波动两部分,如果风险冲击导致的家庭消费水平波动性高于家庭消费水平下降对于家庭福利的影响,那么意味着居民采用保险来对冲死亡风险冲击比储蓄更有效。因为采取预防方式储蓄需要较高的流动性资产,从而会产生过高的持有成本,此时寿险更具优势。另外,储蓄过高可能导致家庭对其他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的忽视,如购买保险(McCluer, 1996)。其次,很多家庭并没有很多资产或者应急资金,如贫困家庭或投资于流动性较差资产的家庭,这些家庭面对负向冲击时是脆弱的(Caner & Wolff, 2004; Sherraden, 2005)。

保险保障是一部分家庭应对某类具体风险冲击的一种主要工具,尤其是中高收入家庭。储蓄只是满足家庭可预期的或者平均消费需求,无法满足在情况最糟糕(如家庭主要成员死亡)时的需求。从理论上说,保险作为一种风险转移工具,可以保障家庭未来不确定性情况下的消费稳定性,有利于家庭制定长期合理的消费计划。保险保障可以有针对性地管理某一类风险,如寿险保障家庭主要成员死亡引发的收入下降,失能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可以抵御健康风险引发的家庭医疗支出(Gertler & Gruber, 2002)。Hakansson(1969)将人的寿命视为一个随机变量,效用函数代表个人遗产动机,只有在购买保险的情况下居民家庭才能在效用函数中实现储蓄—消费—投资最优。因此,从理论上说,保险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不合理结构(Headen & Lee, 1974),有效对冲死亡引起的家庭消费水平的下降风险,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Hubbard et al(1995)的研究表明,拥有保险可以减少家庭储蓄的欲望,同时也能稳定家庭消费。然而,在保险是否能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问题上,最新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购买保险与预防性储蓄两种风险管理工具可能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购买保险可能会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发生非承保风险会对家庭消费产生重要冲击(Dynan, 1993; McCluer, 1996)。Bernheim et al(2001)使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SCF)比较有保险和无保险情形下死亡风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时发现,保险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还发现,年轻家庭的经济脆弱性远大于老年家庭,但只有20%的年轻家庭愿意通过保险来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Bernheim et

al(2003)使用美国退休与健康调查数据(HRS)得出了类似结论,发现家庭寿险持有与经济脆弱性存在显著的不匹配。一方面,43%(49%)的妻子(丈夫)购买了超额的寿险保障;另一方面,很多家庭没有购买任何保险来对冲家庭经济脆弱性,而这部分家庭的经济脆弱性更大。与之相反,Lin & Grace(2007)认为寿险可以有效应对由家庭成员死亡引发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并且年轻家庭比老年家庭更倾向于用保险来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作者进一步将寿险分为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发现定期寿险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度量指标不同:Lin & Grace(2007)构建的脆弱性指标侧重于衡量死亡风险对家庭消费水平波动性的影响,而Bernheim et al(2003)构建的脆弱性指标更多地反映了由死亡风险引发的脆弱性对消费水平平均下降程度的影响。

最后,居民家庭还可以借助社会资本应对风险冲击,如亲戚、朋友的借贷、互助等。这些家庭,尤其是低收入的家庭,受家庭财富少所制约,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低,只能通过诸如非正规金融借贷等民间社会资本来应对。Lusardi et al(2011)分析了美国及其他七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应对风险的方法,发现除了储蓄外,家庭还可以通过变卖资产以及增加劳动供给等方式应对风险冲击。但增加劳动供给反过来又会影响家庭福利,如挤压闲暇时间(Gertler & Gruber,2002)。

综上所述,西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成熟的金融市场使得居民家庭在面对家庭脆弱性时可供选择的方法较多,如储蓄、商业保险、增加劳动供给等。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梳理西方家庭经济脆弱性相关研究发现,从经济脆弱性视角研究居民家庭消费有其自身优势,因为它不仅能有效度量风险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能衡量家庭风险应对能力,这对我国家庭消费和福利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也存在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已有文献在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界定和测度上存在差异。在界定上,家庭经济脆弱性研究已逐渐得到关注,但没有公认的脆弱性界定,也没有在测度上达成共识。部分文献将脆弱性视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部分文献将脆弱性视为现有消费和预期消费的差异。在测度指标上,既有衡量风险冲击对

家庭消费水平平均下降的影响,也有对消费波动性的影响,造成界定和测度没有形成共识的主要难点在于,在考虑到风险冲击和家庭管理风险能力的基础上,如何基于当前和过去的消费预测未来的消费和福利。正是因为存在界定和测度上的差异,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差异,使得我们无法在统一框架下比较不同测度方法或测度指标所带来的研究结论差异性。

其次,理论研究不足,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分析。从家庭经济脆弱性视角研究居民消费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理论方面缺乏创新和拓展。早期研究将家庭经济脆弱性简单视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或风险冲击前后家庭消费的差异。后期研究尽管采用了期望效用理论,将风险、家庭经济脆弱性与消费有效联系起来,拓展了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理论基础,但还是缺乏一个系统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理论分析框架,尤其是没有将家庭经济脆弱性纳入到家庭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去刻画其对家庭福利的动态作用机制,系统、动态地研究各种风险冲击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另外,现有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研究缺乏对风险、脆弱性及家庭应对能力三者之间的相互传导机制的研究,尤其是反向研究,如应对能力对脆弱性的影响。

最后,在实证研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居民消费为研究对象,缺少来自中国及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据。中国家庭消费决策行为与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差异,来自发达国家的证据无法推论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以及应对能力。在家庭经济脆弱性的风险识别上,现有研究局限于要么基于整体风险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分析,如贫困风险、聚合风险;要么是基于单一风险,如死亡风险,构建单一的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对由其他风险引起的脆弱性指标研究较少。尤其是,忽视了风险之间的遮掩效应或叠加效应,无法全面衡量风险冲击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此,对影响家庭经济脆弱性的风险识别还需进一步研究,尤其需要注意这些风险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和依赖性。这就需要以家庭经济脆弱性为核心,构建分层次的家庭经济脆弱性体系,包括宏观风险、制度风险及微观家庭异质性风险等。

尽管西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但仍为我国相关研究拓展了新的视角,因为家庭经济脆弱性可以有效衡量风险冲击对我国家庭消费的

影响,更重要的是它能评估我国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然而,在借鉴西方家庭经济脆弱性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我国家庭风险特点和消费特点,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的作用机制,才能更好地为政府制定、评估和改进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首先,家庭经济脆弱性对我国家庭消费的影响,既有风险自身冲击的影响,又有家庭应对能力的影响;既有对消费平均水平下降的影响,也有对消费波动性的影响。因此,我国学者应该充分考虑风险冲击对我国家庭消费影响的特殊性。

其次,与西方国家家庭相比,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可能更普遍。一方面,我国现阶段还存在部分贫困家庭,这些家庭的消费不仅受风险冲击的影响大,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很低,需要政府亟待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将此问题列为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我国普通居民家庭消费也面临着风险,甚至是返贫风险。与贫困家庭相比,普通居民家庭尽管收入较高,但在较低经济增长速度背景下,风险冲击可能对消费的抑制性影响起到杠杠作用,进一步降低家庭消费水平,普通甚至中等收入家庭也有可能重新陷入贫困。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要使偏低收入家庭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要让现有的中等收入家庭不会因为各种风险冲击重新进入低收入群体中,甚至陷入贫困,出现“因病返贫”、“房奴”等极端现象。扶贫问题与返贫问题都反映出风险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冲击具有普遍性。

第三,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可能更大。与西方国家家庭相比,我国家庭消费面临的成员死亡、健康以及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等风险比西方更严重。首先,我国的人口死亡率更高,平均每5—6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会面临家庭主要成员死亡的冲击^①;其次,负债已逐渐成为我国家庭普遍存在的主要经济行为。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上看,我国家庭负债规模从2007年的5.06万亿增长到2014年的23.15万亿,平均年增长率约为24.7%,远超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城镇、农村分别为9.2%和8.1%)和消费增长率(城镇和农村家庭分别为10.7%和12.9%)。从负债结构看,2014年,消费性负债占家庭总负债的65.8%,其中以房屋抵

押为主的中长期负债占消费性负债的85%。在此不同背景下,我国家庭目前的负债状况是否过度?家庭负债规模和负债结构在短期和长期如何影响家庭不同消费?是促进消费还是制约消费?由负债引起的“房奴”、“卡奴”在我国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家庭负债行为对消费异质性影响的问题需要我国学者结合家庭经济脆弱性予以研究。最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渐进式改进阶段,保障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也抑制了家庭消费,尤其是医疗保险制度的不确定性也抑制了家庭消费,尤其是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受到转型的初始条件与路径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确定性,使得医疗制度的改革多以过渡性政策的形式出现,加大了微观家庭的医疗支出风险,尤其是居民家庭自行承担的医疗支出,导致居民家庭财富急剧下降,影响了消费和福利。

第四,我国居民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还不足。与西方国家的家庭相比,我国家庭居民应对风险冲击的手段主要是储蓄,其他措施较少。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通过对48000户城镇和农村家庭进行调查发现,拥有寿险的家庭样本总数为8301,占总家庭样本的17.29%,远低于美国家庭的84%(Lin & Grace, 2007)。这表明我国居民家庭缺乏对保险的理解和应用。尽管西方居民家庭在应对家庭经济脆弱性时也可以借助于社会资本,如亲戚、朋友等非正规方式,但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市场使得家庭居民很少采取社会资本来对冲,这一点与我国有较大的差异,比如我国居民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在面临风险时,受家庭财富较少、金融可得性低、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制约,在很多时候只能通过社会资本(包括高利贷)来对冲家庭经济脆弱性,而这反过来又加大了农村家庭的脆弱性,这就需要我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我国的现实情况。

综上所述,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相关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厘清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以及家庭风险管理的能力,为我国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今后我国学者在进行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时,应充分了解已有研究文献的基本脉络,梳理已有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不足,将西方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采用我国微观数据进行创新性研究。

注:

①根据2011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男性和女性在25~65岁之间发生死亡的概率分别为16.72%和9.19%,这意味着家庭夫妻双方其中一位出现死亡的概率在16%~26%之间,即在户主

处于工作期间的家庭中,平均每 5~6 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会面临家庭主要成员死亡的冲击。

参考文献:

- Alwang, J. et al(2001), "Vulnerability: A view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World Bank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0115.
- Anderloni, L. et al(2012),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Research in Economics* 66(1): 284—296.
- Asfaw, A. & V. Braun (2004), "Is consumption insured against illness? Evidence on vulnerability on households to health shocks in rural Ethiop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3(1):115—129.
- Attanasio, O. P. & G. Webber (2010), "Consumption and saving: Models of intertemporal alloc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8(3):693—751.
- Auerbach, A. J. & L. J. Kotlikoff(1987), "Life insurance of the elderly: Its adequacy and determinants", in: G. Burtless (eds), *Health, and Income among the Elderl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Auerbach, A. J. & L. J. Kotlikoff(1991a), "The adequacy of life insurance purchase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3):215—241.
- Auerbach, A. J. & L. J. Kotlikoff(1991b), "Life insurance inadequacy: Evidence from a sample of older widows", NBER Working Paper, No. 3765.
- Barnes, S. & G. Young(2003), "The rise in US household debt: Assessing its causes and sustainability", Working Paper No. 206, Bank of England.
- Bernheim, B. D. et al(2001), "The mismatch between life insurance holdings and financial vulnerabilities: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8544.
- Bernheim, B. D. et al(2003), "The mismatch between life insurance holdings and financial vulnerabilities: Evidence from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1):354—365.
- Browning, M. & T. F. Crossley(2001),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 levels and consumption chang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0:1—23.
- Caner, A. & E. N. Wolff(2004), "Asset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4—99: Evidence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Review of Wealth and Income* 50(4): 493—518.
- Chamon, M. & E. Prasad(2010),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 in China rising?",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1):93—130.
- Chamon, M. et al(2013), "Income uncertainty and household saving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5 (4):164—177.
- Chaudhuri, S. (2000), "Empirical methods for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Mimeo, Columbia University.
- Chaudhuri, S. et al(2002),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 sectional data: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0102—0152, University of Columbia.
- Chaudhuri, S. (2003), "Assess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Concepts, empirical methods and illustrative examples", Mimeo, Columbia University.
- Christiaensen, L. J. & R. N. Boivert(2002), "On measuring household food vulnerability: Case evidence from northern Mali", Working Paper No. 5, Cornell University.
- Crook, J. N. et al(2007),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nsumer credit risk manage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83(10):1447—1465.
- Deaton, A. S. (1992), *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Dercon, S. & P. Krishnan(2000), "Vulnerability, seasonality and poverty in Ethiop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6(6):25—53.
- Dynan, K. E. & D. L. Kohn(2007), "The rise in U. S household indebtednes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No. 37.
- Dynan, K. (1993), "How prudent are consum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6):1104—1113.
- Edwards, R. D. (2008), "Health risk and portfolio choice",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26(4):472—485.
- Engen, E. M. & J. Gruber (2001),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7(3):545—579.
- French, E. & J. B. Jones(2011), "The effects of health insurance and self-insurance on retirement", *Econometrica* 79(3):693—732.
- Gertler, P. & J. Gruber(2002), "Insuring consumption against ill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1):51—70.
- Gorbachev, O. (2011), "Did household consumption become more volati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5):2248—2270.
- Gruber, J. & A. Yelowitz(1999),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and private sav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 (6):1249—1274.
- Hakansson, N. H. (1969), "Optimal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strategies under risk, an uncertain lifetime, and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0(3):443—466.
- He, Z. G. & W. Xiong(2009), "Dynamic debt runs", NBER

- Working Paper, No. 15482.
- Headen, R. S. & J. E. Lee(1974), "Life insurance demand and household portfolio behavior",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41(4):685—698.
- Holzmann, R. et al(2003), "Social risk management: The World Bank's approach to social protec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orld Bank Research Paper, Washington, D. C.
- Hubbard, R. G. et al(1995),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social insur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2):360—399.
- Hurd, M. D. & D. A. Wise(1989),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widows: Assets before and after the husband's death", in: D. Wise(ed), *The Economics of Ag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ha, R. et al(2010),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poverty in Tajikistan", *Economic Change Restructuring* 43(3):95—112.
- Kamanou, G. & J. Morduch(2002),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WIDER Discussion Paper, 58.
-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 Kochar, A. (1995), "Explain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idiosyncratic income shock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159—164.
- Kuhl, J. J. (2003), "Disaggregat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Analyzing fluctuations in consumption using a simulation approach", manuscript, Institute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 Ligon, E. & L. Schechter(2003),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Economic Journal* 113(486):95—102.
- Lillard, L. A. & Y. Weiss(1997), "Uncertain health and survival: Effects on end-of-life consump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15(2):254—68.
- Lin, Y. & M. F. Grace(2007), "Household life cycle protection: Life insurance holdings,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d portfolio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74(1):141—173.
- Lusardi, A. et al(2011), "Financially fragile household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83—150.
- Lypton, M. & M. Ravallion(1995), "Poverty and policy", World Bank Research Paper,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 Mansuri, G. & A. Healy(2001), "Vulnerability prediction in rural Pakistan", Paper Presented at IFPRI-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Risk and Vulnerability: Estima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 C., Sept. 23—24.
- McCluer, M. (1996), "Health insurance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1):285—295.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2), "Debt and deleveraging: Uneven progress on the path to growth", Research Paper, McKinsey & Company.
- Minsky, H. (1982), "The financial fragility hypothesis: Capitalist proces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economy", in: C. P. Kindleberger & J.-P. Lafargue(eds), *Financial Cri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rphy, R. (1999), "Household debt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8496.
- Olney, M. L. (1999), "Avoiding default: The role of credit in the consumption collapse of 193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1):319—335.
- Pritchett, L. et al(2000), "Quantify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 proposed measure, applied to Indonesia", World Bank Research Working, No. 2437.
- Rust, J. & C. Phelan(1997), "How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affect retirement behavior in a world of incomplete markets", *Econometrica* 65(4):781—831.
- Scaramozzino, P. (2006),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to food insecurity", Working Paper No. 06—12, Agricultur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Division,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 Seefeldt, K. S. (2015), "Constant consumption smoothing, limited investments, and few repayments: The role of debt in the financial lives of economically vulnerable families", *Social Service Review* 89(2):263—300.
- Sherraden, M. (2005), "Inclusion in asset-based polic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Jan 25.
- Viscusi, W. K. & W. N. Evans(1990), "Utility functions that depend on health status: Estimates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3):353—374.
- World Bank(200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Y. & G. Wan(200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11(2):196—212.

(责任编辑:李仁贵)